

## 國家圖書館 2010 年入藏阮元文獻舉要

王維若

**內容提要：**阮元是清代著名學者，2010 年國家圖書館入藏了一批阮氏後人轉讓的帶有阮元手跡的珍貴文獻，包括《周易注疏校勘記》的稿本和謄清本，《印譜》、《擘經室詩集》等。本文通過對這批文獻的逐一審視，試圖對這批文獻的價值作一次初步的表述。

**關鍵詞：**阮元 周易注疏 校勘記 擘經室

2010 年 4 月，清代著名學者阮元後人江蘇省鎮江市阮錦雲女士及其表兄輾轉將家藏的一批與阮元相關的珍貴文獻呈交國家圖書館，在張志清副館長的帶領下，館內資深專家丁瑜、楊成凱、李致忠等先生組成了鑒定團，一起對這批阮氏文獻進行了進一步的鑒定。經各位專家審定，一致認為：阮氏兄妹所藏的阮氏文獻價值甚高，其中《周易注疏校勘記》分前後兩部稿本（稿本及謄清本），謄清本更接近出版定本，客觀反映了《十三經注疏》的刊刻過程；從字跡比對看，文中一些朱墨批校應為阮元手筆。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在我國經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得到後世學者的重視。雖然其中一份稿本已殘缺，使其價值受到一定影響，但《周易注疏校勘記》前後兩個修改稿對研究《十三經注疏》的刊刻史仍具有很大的文獻價值，仍不失為一批珍貴文獻。最終，這批阮氏文獻落戶國家圖書館，獲得了新的歸宿。

### 一、本批入藏國家圖書館的阮氏藏書目錄

1. 《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2 冊 180 頁，有阮元朱筆批注，缺卷四至卷七。
2. 《周易注疏校勘記》，謄清本，3 冊 142 頁，稿本朱批已入謄清本中。
3. 《信札》（卷首題“先文達公官封遺稿”），抄本，1 冊；內容 28 葉，上下書衣各 1 頁（阮元書信集裏沒有出現）。
4. 《擘經室詩集》（書衣右上“五古”），抄本，1 冊。
5. 《印譜》，1 冊；書衣上下各 1 頁，護頁各 1 頁，內容 32 頁；散本 149 頁（散葉：有墨拓與朱拓兩種鈐印，每葉上有一至兩枚鈐印）。
6. 《阮氏家廟生歿忌辰單》，抄本，1 冊 8 頁，紅箋。書衣上下各一頁。
7. 《雷塘盦主弟子記》，刻本，2 冊。序為朱刻。共八卷。
8. 書衣題“耕研山房藏”（僅存“魯師母記”），抄本，1 冊，最後幾頁有一些鈐印（冊中有白頁，當是貼字脫落。右書角有損）。

9. 《仲璋二伯祖遺稿》，抄本，1冊（書衣題二冊）。
10. 蘇東坡等十七人詩抄，抄本，1冊（此本字體與《信札》大致相似）。
11. 《撫今追昔之碑》，拓片，1張。
12. 《康寧硯拓》，1張。

阮元（1764—1849），揚州儀徵人，字梁伯（一作良伯），改字伯元。號雲臺，又號臚洲仙客、雷塘庵主、雲翁、蒼山畫仙。晚號節性齋主人、寧經老人、怡性老人、北湖跛叟等，諡號文達。生於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

阮元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進士，他既是晚清中後期的三朝重臣（乾隆、嘉慶、道光），又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文獻大家，是乾嘉學派後期的傑出代表人物。此外，阮元還集著作家、刊刻家於一身，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造詣，被尊為一代文宗。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有《阮元傳》稱：

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敕編《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再入翰林，創編《國史儒林》、《文苑傳》，至為浙江巡撫，始手成之。集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二種，撰提要進御，補中秘之闕。

……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百八十餘種，專宗漢學，治經者奉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章絕學。重修《浙江通志》、《廣東通志》，編輯《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兩浙輶軒錄》、《淮海英靈集》，刊當代名宿著述數十家為《文選樓叢書》。自著曰《寧經室集》。<sup>①</sup>

阮元一生著述豐厚，有《寧經室集》五十八卷，《詩書古訓》九卷、《曾子注釋》四卷、《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華山碑考》四卷、《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五卷、《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七卷、《廣陵詩事》十卷、《石渠隨筆》八卷、《小滄浪筆談》四卷等多種著作傳世。正如《清史稿》中所言：“他紀事、談藝諸編，並為世重。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sup>②</sup>

## 二、《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過程

《十三經注疏》歷來有多種版本，南宋以前，經、疏分別單行刊印。宋紹熙間，三山黃唐始有合刊本，宋南渡之後，刊刻了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建本附釋音注疏的十行本，此乃經文合疏合刻較早，後世流傳最廣的版本。明嘉靖間有據十行本重刻的閩本；萬曆間有據閩本重刻的監本；崇禎間有據監本重刻的汲古閣毛氏板。各本輾轉翻刻，訛謬甚多。到了清代，明監板已燬，通行各省書坊的版本主要就是汲古閣毛氏本。阮元在青少年讀書時就發現當時流行的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錯誤較多，“漫漶

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sup>③</sup>，因此在阮元 20 歲的時候便有了校勘《十三經注疏》的志向。《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二載：“先是，先生弱冠時，以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多訛謬，曾以《釋文》、《唐石經》等書手自校改。”<sup>④</sup>

乾隆五十六年（1791），28 歲的阮元奉詔擔任《石經》的校勘官。《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一載：“十一月，奉詔充《石經》校勘官，時先生分校，得《儀禮》。而那祭酒以《爾雅石經》、彭大司空以《毛詩石經》屬先生襄理，亦多所商正。”<sup>⑤</sup>阮元《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中對這一經歷亦有記錄：“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sup>⑥</sup>這些史料說明，這一次奉詔對《石經》進行校勘的過程，使得阮元增加了很多的實踐經驗。

嘉慶五年（1800），阮元任浙江巡撫時，將自己的校本與收集的各種版本交給他的朋友或者門生顧廣圻、李銳等人，由他們做進一步的校勘，最後阮元再親自覆核，完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陳康祺《阮刻十三經校勘記》中記載：“蓋公撫浙時，出舊藏宋版十行本十一經，及《儀禮》、《爾雅》單疏本為主，更羅致他善本，屬詒經精舍高才生分撰成書。《易》、《穀梁》、《孟子》屬元和李銳，《書》、《儀禮》屬德清徐養原，《詩》屬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屬武進臧庸，《禮記》屬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屬錢塘嚴傑，《論語》屬仁和孫同元。”

嘉慶十三年（1808），段玉裁為阮元編撰的《校勘記》作序：“（阮元）而以官事之暇，篝燈燃燭，定其是非……犁然悉當，成此巨編。”<sup>⑦</sup>在阮元的不懈努力之下，歷經二十餘年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終於編撰而成。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三對這一版本有所記載：“《十三經注疏校勘》並《釋文校勘記》二百四十五卷，揚州阮元恭撰，嘉慶戊辰揚州阮氏文選樓刊。”<sup>⑧</sup>

嘉慶十九年（1814），阮元出任江西巡撫，在武甯盧宣旬和南昌給事中黃中傑的促和下，歷時十九個月，在南昌學堂主持重刻了宋本《十三經注疏》，並將所撰的《校勘記》附於全經之後，嘉慶二十一年（1816）秋天刻板初成，共四百十六卷，書板藏於南昌府學，自此，士林、書坊皆可以刊印。

在刊刻工作的過程中，阮元對底本的選擇非常重視，他先將能收集到的歷代各種刊刻、精校之本極力網羅，仔細比較後確定以家藏宋十行本《十一經》為底本（缺《儀禮》、《爾雅》兩部），又配以較十行本刊行更早的蘇州北宋所刻賈公彥、邢昺《儀禮》、《爾雅》單疏板本原書，以及自黃丕烈處借入單疏二經作為參考，還配以近監巡道胡稷從吳中購得的《十一經》以補上述藏本之闕，此外，阮元還組織當時精通經學、擅長校勘的學者盧宣旬、黃中傑等人，在自己多年來所撰《校勘記》的基礎上，參考了諸多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等材料，使宋本注疏終於復行於世。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總目錄附記》中曾對選擇底本並交付刊刻的過程有所記載：“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甯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於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以苦毛板之朽，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sup>⑨</sup>

在文獻的校勘方面，阮元一貫反對以臆見妄改古書，主張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所以對《十三經注疏》的校勘工作盡量秉承審慎的原則，“今重刻宋板，凡

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sup>⑨</sup>。至此，阮元主持校勘刊刻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便形成了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嘉慶十三年文選樓單刻本，共二百四十五卷；一是嘉慶二十一年南昌府學合刻本，校勘記分別附於每卷注疏之後，共四百一十六卷。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在南昌府學本尚未全部校刻完畢之時，阮元又於嘉慶二十一年調任河南巡撫，此後的校書人工作不夠完備，使得南昌府學本並非盡善盡美。《聖經室三集》卷二中所收錄的《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後》之末有阮元之子阮福謹案，曰：“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頗不以此刻本為善也。”<sup>⑩</sup>但綜合考量，阮元主持校刻的南昌府學刻本仍然是《十三經注疏》諸本中最善者，亦為迄今流傳最廣的版本。

對於阮刻《十三經注疏》特別是《校勘記》的重大價值，各時期學界評論者甚衆，清代著名學者焦循評曰：“使君按越，論乃諸生。訓詁之學，遂集大成。嘉惠學者，以牖群經。群經之刻，詎缺不明。校以衆本，審訂獨精。於說經者，饋以法程。”<sup>⑪</sup>（焦循《雕菰集》卷六《讀書三十二贊》）

清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點石齋重校縮印阮本前列國學大師俞樾《序》：“問所據何本，曰：‘江西阮刻本也’，余聞之益喜。或曰：‘刻十三經何不遵武英殿本而用阮本為？’余曰：‘是無它，取其有《校勘記》。有阮文達之為《校勘記》，羅列諸家異同，使人讀一本如讀諸本。’”

中華書局對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多次影印，流布甚廣，成為史學專業及檔案文獻整理工作者案頭不可或缺的常用之書。

### 三、本次入藏的《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及謄清本

本次阮氏兄妹轉讓並入藏國家圖書館的“阮氏藏書”中，有阮元《十三經注疏》中的《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及謄清本，從這兩冊《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及謄清本中，我們可從中考察到阮元對《周易注疏》進行編纂與校勘的痕跡。其基本情況著錄如下：

1. 周易注疏校勘記九卷 存五卷（一至三、八至九），周易例略校勘記一卷，周易釋文校勘記一卷

稿本，板框18.4×12.8厘米，每半葉二十行，行三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紅格（部分綠格），單魚尾，無書耳，版心有卷數、頁數，卷一第二頁有“日增泰記”鈐印一枚。文本內容為作者的原稿及修訂，兩種筆跡的朱筆校訂。

毛裝，二冊180頁

第一冊含一至三卷，卷端題：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 臣阮元恭撰；

第二冊為八至九卷，周易例略校勘記一卷、周易釋文校勘記一卷。該稿本錄字經與

國圖藏李銳《觀妙居日記》原稿本比對，確認其中字跡為李銳筆跡。李銳（1769—1817），字尚之，號四香，江蘇元和人。清代數學家。嘉慶初年，李銳接受阮元的邀請到杭州參與《經籍纂詁》和《疇人傳》的纂修編輯工作，後又協助阮元校勘《周易正義》、《春秋穀梁傳注疏》及《孟子注疏》，成果被載入阮元主編的《十三經注疏》之中。

卷末朱筆題：“甲子仲春三日嚴傑校補。”細查此卷末朱筆題字，與稿內朱筆批校之一的筆跡相同，由此可斷，校訂較多的朱筆文字出自嚴傑之手，另一朱筆批校，字數不多，但據筆跡推測，乃出自阮元之手。雖然阮氏校勘的痕跡在該稿本上體現不多，卻也反映了阮氏辨析學術、闡明訓詁的內容。

稿本中有一些內容在最後的刻版中有一定的刪改，通過對稿本的閱讀，以及稿本與最終定稿區別的比較，能夠瞭解到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最初撰寫時的原始思路，對於研究者來說，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 2. 《周易注疏校勘記》九卷，周易略例校勘記一卷，周易釋文校勘記一卷

膳清本，板框 18.2×12.8 厘米，每半葉二十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紅格正楷，單魚尾，無書耳，版心有卷數、頁數，稿本朱批已入膳清本中，文本內容有少量墨筆校改增補和朱筆審訂，推測分別為孫同元和嚴傑手跡。

毛裝，三冊（卷一至三，卷四至七，卷八至十一） 142 頁

卷端：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 臣阮元恭撰

第一冊含一至三卷，第二冊含四至七卷，第三冊含八至九卷及周易略例校勘記（此校以岳本為主）一卷、周易釋文校勘記一卷。

第一冊封底題“約二萬乙千七百六十六/三本約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二”、“甲子十二月十七日鐙下對畢同元記”；第二冊封底題有“約二萬〇百七十”、“甲子十二月百七十”、“甲子十二月十八日同元對畢”；第三冊封底題有“約乙萬七千〇廿六”、“甲子十二月十九日同元對畢”。膳清本中有墨筆校改增補和朱筆審訂兩種筆記，據推測一種是孫同元手跡，一種是嚴傑手跡。根據封底“同元對畢”字樣推斷，該膳清本是由孫同元擔任覆核，嚴傑為最後審訂。據本上著錄的時間（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推算，覆核的時間僅為三天。此後阮氏文選樓印本據膳清本上板刻印，也有稍許增補。

經過稿本與膳清本的簡單比對發現，稿本朱批已收入膳清本正文之中，膳清本修改了稿本脫訛之字，對稿本又略作了一些字句上的改動與調整，膳清本正文中仍有墨筆圈點及少量朱批。另外，膳清稿中偶有脫字，恰好可以參照稿本補全。

據稿本、膳清本和刻本提供的信息綜合分析，可以大致推測出其纂刊流程：一、分任者李銳完成初稿並作自我修訂；二、嚴傑校補調整；三、阮元批校；四、膳清成稿；五、孫同元覆核，並有少量增補；六、嚴傑審訂；七、刊刻成書（刊本校樣仍有少量增補）。從稿本到刻本，文字內容甚至文本結構都有更動。

#### 四、本次入藏的與阮元相關的其他文獻

《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及謄清本之外，阮氏兄妹還轉讓給國家圖書館另外一些與阮元生平相關的文獻資料，書目及基本著錄情況如下：

1. 《信札》，抄本，1冊，內容28頁，開本25.2×12.2厘米，上下書衣各1頁，毛裝。每半葉10行，字數不等。卷首題“先文達公官封遺稿”，阮元歿後諡“文達”，世稱“文達先生”或“文達公”，卷中信件多為與政府官員的覆函，如“覆閩撫李”、“覆慶五將軍”、“覆河南撫馬”、“覆河南方伯方”等。

2. 《擘經室詩集》不分卷，抄本，開本24.2×15.7厘米，1冊。書衣右上題“五古”二字。封面蠹蝕較嚴重。每半葉6行19字，小字雙行同，無格，版心有“擘經室詩集”、“五古”及頁碼標識。詩集中所收皆為阮元五言古體詩，有詳細的詩題，題下標明時間，如壬子、乙卯等等，全書共收入阮元五言古體詩將近200首。經粗略觀察，阮元的五言古體詩所涉題材主要集中在游覽、賞景、交游、家居閑吟、友人聯句、書畫題詠等方面，如《牛欄山 乙卯》、《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 甲寅》、《早行 甲寅》、《自禹登山白雲峰東三里至佛峪 乙卯》、《桐廬九里洲面江背山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游奉命賦詩 丁巳》、《西園即事聯句 丙辰》、《題書之靜春居圖卷子 辛未》等等。此外，也有一些記述民生的題材，比如《浙東賑災紀實 庚申》、《種菜 辛未》等等。從這些詩題就可以簡單地窺測到，阮元是一個很樂於享受自然風光的人，他經常到自然界中去尋訪美景，他的足跡遍佈南北各地。同時，他也是一個願意用詩歌來描述生活的人，生活裏很細微的經歷，他都樂於用詩句來體現，他的語言平實曉暢，明白如話，詩風自然樸實。自古以來“詩言志，歌詠言”，詩歌在古人的世界裏並不僅僅是一種文學題材，更重要的是承載着中國文人“言志載道”的文化功用。所以，通過這些詩歌所反映出的也不僅僅是阮元的詩才，同時更是他生活行跡、人生軌跡、交際交遊的現實記錄。阮元的詩集較少以單獨的《詩集》形式刊行，我館館藏只《擘經室詩錄》（五卷）一種，更多的阮元詩歌是以阮元著作合集的方式傳世，其詩作大多被收入阮元所撰之《擘經室集》中，所收詩歌基本按創作時間排序（如：詩卷一：乙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詩卷二：乙卯、丙辰等等），編輯時沒有特意強調詩體，五言七言、古體和律詩合於一處。從這個角度來說，此冊以五言古體詩為內容的《擘經室詩集》抄本便具有着一種獨特的文獻價值。

3. 《印譜》，1冊及散本149頁。《印譜》，書衣上下各1頁，護頁各1頁，內容32頁。書中另有兩個夾條，一張上有19枚鈐印、另一張上有3枚鈐印。紙上有“維揚雲藍閣製”字樣；散葉：有墨拓與朱拓兩種鈐印，每葉上有一至兩枚鈐印。

4. 《阮氏家廟生歿忌辰單》，抄本，1冊8頁，開本24.2×13.1厘米，毛裝，紅簽，每半葉10行。書衣上下各一頁。書內夾有若干小紅簽，上有一些文字說明，如“十一世竹諭公張宜人 十月十六日歿忌”、“十一世竹諭公張宜人 三月二十一日生忌”、“十一世彥融公淑配康 孺人二月二十三日歿忌”、“十一世彥融公淑配康 孺人四月十二日生忌”等等，似為對正文的補充。卷末有“以上生辰詳明按月照期設供毋

得有誤”字樣，足見生辰忌在阮氏宗族中的嚴肅與重視。

5. 《雷塘庵主弟子記》八卷，清刻本，2冊，線裝，板框18.3×13.8厘米，卷前有牌記“雷塘庵主弟子記 琅嬛仙館”，序為朱刻，每半葉10行20字，白口、四周雙邊。烏程弟子張鑒等編，羅士琳校（卷內有：“甘泉受業羅士琳校”字樣）。

《雷塘庵主弟子記》是由阮元弟子張鑒、門生柳興恩，以及其子阮常生、阮福、阮孔厚、阮祐合撰，以相當的篇幅記述了阮元歷官各地的政績、皇帝的論旨和賞賜、阮元的奏疏等，展示了阮元作為朝廷命官的人生側面。目前傳世的該書有七卷本與八卷本，此部書為八卷本。《雷塘庵主弟子記》後經黃愛平點校，於1995年由中華書局以《阮元年譜》為書名出版。

6. 《蘇東坡等十七人詩抄》，抄本，1冊（此本字體與《信札》大致相似），開本22.8×12.6厘米。每半葉8行28字，字數不等。綠格、白口，邊欄旁有“雲蘭閣”字樣。封面墨筆題：“蘇東坡、陸放翁、黃涪翁、王陽明詩、陶淵明、李太白、李昌谷、王摩詰、顧逋翁、王仲初、孟襄陽、李義山、杜牧之、岑嘉州、王少伯、溫飛卿、漁陽詩附後。”

但細檢全書，實際上書中只有九位詩人的詩作，其中包括眉山蘇軾詩（15葉）、山陰陸游詩（8葉）、隴西李白詩（8葉）、王摩詰詩（8葉）、杜牧之感懷詩（8葉），王陽明先生詩（4葉）、陶靖節詩（9葉）、黃山谷詩（6葉半）、李長吉詩（16葉半）。此九位詩人都是魏晉唐宋以來最為知名的詩人，但詩風迥異，各屬不同的流派和風格，精選此七位詩人的詩作抄寫集成，且並非按年代先後排序，可以從中窺出選詩者的價值觀照及審美傾向。是書天頭上有較多的墨筆小字批注，批注內容主要是對詩歌及作者的解讀，書內還有墨筆圈點及句讀。

7. 《仲璋二伯祖遺稿乙冊》，抄本，開本22.6×12.8厘米，1冊（書衣題二冊），毛裝。此書分前後兩個部分，兩部分抄寫字體不同，前半部分紅方格，板框17.3×10.7厘米，每半葉6行，字數不等，抄寫字跡潦草，辨識不易；後半部分紅豎格，板框18×10.3厘米，8行22字，左右雙邊，大黑口，抄寫字跡工整。

8. 另有一冊書，書衣題“耕研山房藏”、“洗桐館主檢存”（僅存“魯師母記”），抄本，1冊，開本24.6×13.8厘米，最後幾頁有一些鈐印（冊中有白頁，當是貼字脫落。右書角有損）。

阮元在金石領域頗有造詣，以收藏鐘鼎彝器和碑刻版本既多且精而著稱於時，他一方面熱衷於與著名的金石學家、收藏家們交好，並互相饋贈，另一方面，依靠宦游所至的便利，必去尋訪古跡，勤於搜訪金石。阮元的愛好之一，就是常將一些稀有珍貴的青銅器、碑版文字依拓本仿原形摹鑄或摹刻保存，還喜歡親臨名勝之地摹刻碑石。因此，隨着這批書籍文獻而來的還有阮氏所藏拓本兩種：

9. 《撫今追昔之碑》拓片，1張，4行11字，拓者不詳。碑文內容為：

先文達公滇南秋祭詩云

滇南宦最遠 今惟仲子隨

仲子文筆拙 經義微能窺

疏經成十卷 閱之頗解頤 注始福兄孝經義疏補初成

贊郎任子間 所執或不卑

10. 《康寧硯拓》，1張。是為一方硯臺的拓本，該硯上方中心有“康寧”二字，四圍有“乾隆癸丑重華宮茶宴以洪”、“範九五福之三日康寧聯句”、“恩賜此研因集樵石鼓字銘之”、“內廷供奉詹事臣阮元敬識”字樣。

## 五、文獻入藏過程

2010年4月，阮元後人江蘇省鎮江市阮錦雲女士欲將其家藏阮氏文獻十種十四冊、拓片兩種兩張出售。阮氏兄妹的表兄高瑞興老先生得知此消息之後，立即勸說表妹一家人不要將這批珍貴手稿出賣給書商。高瑞興先生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他深知阮氏文獻的歷史意義與文獻價值，高先生認為，這批寶貴的文獻只有收歸國家纔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隨即，高先生立即給自己的大學同學，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嘉璐先生去了一信，表達了想將阮氏文獻轉讓國家的意願。身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的許嘉璐先生也同樣深知這批阮氏手稿的重要價值，遂將該信轉給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古籍保護中心的傳遞之下，高先生的信件最終轉到了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古籍館的領導們對這件採訪工作非常重視，經國家圖書館領導批准，立即委派館內多年從事古籍研究工作的善本組有慶同志和金石組的盧芳玉同志專程赴江蘇鎮江阮氏兄妹處訪書，對他們家藏的這批阮氏文獻進行了初步的鑒定。此後，在多方努力之下，阮氏兄妹又被邀請至京，在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同志的帶領下，由館內資深專家丁瑜、楊成凱、李致忠等先生組成了專家鑒定團，一起對這批阮氏文獻進行了進一步的鑒定。

高瑞興先生的兩個兒子都在國外，但他卻一心想把珍貴的古籍善本留藏於國家，收藏在我們國家圖書館，在雙方對價格的協調過程中，高先生也做了最大的努力，盡力說服阮氏兄妹適當降低價格，盡量以較為優惠的價格將這批珍貴手稿文獻轉讓給國家。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一片拳拳愛國之心非常令人感動，這批阮氏文獻也終於藏得其所，獲得了最好的歸宿。

### 注釋：

①②《二十五史·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89頁。

③⑨⑩⑪阮元：《學經室集》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中華書局，1993年，619—621頁。

④⑤《雷塘庵主弟子記》，《續修四庫全書》55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41頁。

⑥阮元：《學經室集》二集卷八，《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中華書局，1993年，590頁。

⑦《續修四庫全書》18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6頁。

⑧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3頁。

⑫焦循：《雕菰集》卷六《讀書三十二贊》，《續修四庫全書》148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64頁。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